



张志清 护古籍 传文脉

■ 记者 田莹

有人说,搞古籍研究的人,身上都带着一股旧纸陈墨的味儿,离烟火气太远。可见了张志清,这个想法准得变。这位资深古籍保护专家没半点架子,嗓音温润,眼神带笑,像亲切的长辈。聊起古籍,话匣子一打开,简直就是半部中国古籍保护的活历史。

从背着书包踏入北京大学校园,到推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再到如今天津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这位古籍守护者用半生光阴开辟出一条文脉传承之路。他让蜷缩在木箱中的千年典籍重获新生,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常人觉得枯燥的古籍
在他眼里却意趣盎然

清晨七点的北京站,张志清踏上开往天津的列车。每周三他都有固定行程,到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参与教研和授课。“退了休,反倒更忙了。”他笑着晃手机,屏幕上连串未读消息记录着他的工作节奏:既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古籍项目发来的咨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和高校的讲座邀约。

若不是张志清自己提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如今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少年时曾深受父辈的困扰。“我父亲是新华社记者,母亲是哲学教授。受他们的影响,我喜欢辩证思维,也酷爱文学。”张志清回忆道,“那时候我口吃严重,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点醒我——不如选个动笔而非动嘴的专业。”就这样,张志清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中文学系古典文献学专业。

拿到课程表,张志清反复看了几遍,六门核心专业课分别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他傻了,“皓首穷经、焚膏继晷等一堆成语从我脑子里往外冒,这简直太枯燥了!”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门专业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别人觉得枯燥的版本比对、目录编纂,我却能从中找到乐趣,就像在解开一个个文化密码。”不知不觉间,那些曾让他畏惧的古籍,渐渐成了可以和他对话的朋友。

大学毕业后,张志清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天津街分部,做一般古籍的采访、编目和整理。报到那天,站在简陋的库房前,书库内古籍堆积如山,空气中夹杂着霉味儿,打开书箱就会扬起粉尘,喘气儿都觉得嗓子发紧。这番景象与想象中的书香殿堂相去甚远,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的工作枯燥而机械,且多是面上、皮上的学问,不涉及古籍内容的深度整理,只需按经史子集分类编目。”他每天至少完成八种古籍的编目,重复性强,毫无创造性。

参加工作没几年,赶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张志清回忆:“看着同事们西装革履地谈论生意经,我也动摇了。”但是,每当他的指尖触碰到泛黄的书页,感受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心便又安定下来。他对这份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坚守了十几年,逐渐摸清了古籍背后的文化体系,成长为能精

准鉴定版本的行家。

1998年,张志清调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库与普通古籍库完全不同:工作人员取书时垫着木板,用铅笔轻轻记录,连呼吸都要刻意放轻。那种把古籍当成眼睛一样爱护的态度,让“古籍保护”四个字在他面前具象化了。在这里,他学到了保护古籍的第一课——用一方木板托住古籍,装线的部分朝前,双手捧着行走,防止树叶被风吹开,挂签遗失。

更让张志清受益的是善本特藏部专家冀淑英老师对他的言传身教。一次,他为区分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的不同修版,将多本印本摊满桌面做比对。冀淑英路过时默默上前,一本一本合上古籍,码放齐整后提醒他:“古籍不能随意摊开,风一吹纸叶易损。”这句朴素却郑重的叮嘱,让张志清体会到其中的敬畏,更促成了他从“古籍整理者”到“古籍守护者”的转变。

筹建敦煌遗书库房
推动古籍保护计划

“古籍保护是一件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事。”聊起自己坚守的事业,张志清总爱说这句话。这份感触,源自他筹建敦煌遗书库房时的经历。350万元拨款,不仅让国宝有了“新家”,更孕育了后来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21世纪初,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不少珍贵典籍,因缺乏妥善保护而面临损毁风险,改善保护条件、申请专项资金迫在眉睫。时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周和平将申请专项资金的重任交到善本特藏部,叮嘱大家:“古籍保护这件事,光靠冰冷的数据和文字说不透,得找个能让人共情的点,讲好背后的故事。”

馆藏古籍品类繁多,究竟哪一件最能承载情感、唤起关注?大家的目光落在敦煌遗书上。这些曾在丝绸之路流转千年的典籍,不仅见证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更带着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当年因战乱大量敦煌文献流散海外,在恒温恒湿的库房中得到精心呵护;而藏于国家图书馆的16000多件敦煌卷子和残片,却仍挤在抗战时期遗留的十几个旧木箱里。大家心里都有了答案:以敦煌文书为切入点讲述保护困境,既能看见古籍的危急处境,又能唤起对文化遗产的珍视,远比单纯罗列数据更有力量。

2000年的一个冬日,张志清陪同财政部领导调研。在堆放着敦煌遗书的旧木箱前,他诚恳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当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外国博物馆都为其配备了专门的库房和柜子;而我们自己留下的这些,却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再这样下去,这些国宝恐怕真要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调研结束后,财政部很快对国家图书馆的申请进行测算,批复了350万元拨款。这笔资金如同冬日里的阳光,照耀着古籍保护的希望。

张志清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带领团队精打细算,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定制144个楠木书柜、12000多个楠木书盒、3000多套楠木夹板,不仅妥善安置了敦煌遗书,还把4813卷《赵城金藏》和珍贵的西域文献都放置其中,并用结余资金添置了3个大叶紫檀书柜,将162册《永乐大典》一并纳入保护。这些曾经



张志清

1964年出生,天津武清人。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策划并组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推出“中华古籍资源库”。

“寄人篱下”的文化瑰宝,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安稳归宿。

2003年,敦煌新库落成,媒体争相报道,古籍保护从图书馆的小众业务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从2003年到2007年,张志清带领团队又肩负起一项重要使命——为即将启动的全国性古籍保护计划绘制蓝图。

图书馆古籍界除了传统的保护与整理,是否要推动全国性的古籍保护重点项目,从根本上改变古籍保护的面貌?面向公众的服务该如何落地?更关键的是人才培养的革新——当时古籍修复主要依靠师徒相授,缺乏系统的学科建设。

在一次会议上,张志清提出“从大学本科开始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设想,引发热议。有人说:“修复师就是做手工活儿,大专学历足够了。”图书馆学家倪晓建支持张志清:“现在银行柜台的职员都有研究生学历,我们守护文化瑰宝的修复师,为什么不能有本科生?”在场众人陷入沉思。后来,“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正式成为大学的专业学科。

张志清与团队一起,先后编写了三十多个项目文本,主持制定了六个国家级标准。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这是中国首个国家级古籍保护工程。

智能化保护古籍
让文脉生生不息

古籍保护不只是与时间赛跑,也是与时代对话。张志清说:“保护是基础,活化才是让千年文脉持续流淌的关键,而数字化正是解开古籍‘藏与用’矛盾的钥匙,数字化浪潮的到来,给古籍活化打开了一扇新窗。”

他牵头推动国家图书馆大规模古籍数字化项目,带着“古籍是公器,该让所有人能用”的想法,打造了无需注册的“中华古籍资源库”。资源库收录的古籍数字资源包括敦煌、西夏、金石等专题,还能跨库检索、关联论文。过去读者跑遍各大图书馆才能见到的善本,如今坐在家里点几下鼠标就能查阅。

说起新技术给古籍保护带来的变化,张志

清的语气里满是感慨:“敦煌遗书中有一些黏在一起的字纸,古人做成了书包的样子,拆掉就会损毁文物,不拆就不能读到文献,怎么办?过去没办法,但如今有了核磁扫描等非接触式技术,不用动文物分毫,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页内容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技术真正的价值,既守住了古籍的完整,又让它的內容能被好好研究、充分利用。”

张志清致力于让古籍走出书库,融入人们的生活。这个想法源于他在法国《费加罗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法国人十分重视核心价值和文化遗产,把文化创意作为战略,大到工业制品,小到日常物件,都有着明显的国家文化印记。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国家图书馆成立了文创公司,一系列以古籍为主要特色的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亿元。而在张志清看来,文创不仅是礼品,古籍活化的核心也不是简单的商业化,构建价值观、历史观和情感认同,才是其价值所在。

“让古籍里的元素有机融入产品和文化,不管是工业产品、数字游戏还是影视作品,以此引发年轻人的共鸣,让他们从心里认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使用和表达。”张志清举例说,“华为用‘鸿蒙’‘麒麟’命名产品,其背后是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巨大的文化生态,是真正能走出去的文化品牌符号。”

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深厚情感,让张志清在退休后选择以新身份延续使命。2025年6月,祖籍天津的他接过天津师范大学的聘书,担任特聘讲座教授。“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积淀深厚、文脉悠长,早年周叔弢等古籍收藏大家为我们国家的古籍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而最打动我的,除了故乡情结,还有学校对这项事业的真诚投入——不仅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配备专人编制,更在前期就投入两千余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和学术活动。这不是图虚名,而是要搭建一个能长久发展的平台。”张志清说,在这里,他看到了古籍保护事业薪火相传的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培养了人才,创建了学科,让古籍保护成为全民认可的事业。至于未来的篇章,就要交给年轻的守护者去续写了,相信他们会给出更好的答卷。”

对话张志清 古籍没有固定解读方式 不同视角挖掘多元价值

记者:您在古籍保护领域工作了一辈子,经历了从手工操作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变,这种技术变革给古籍保护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张志清:最大的改变是打破了古籍保护的时空限制和专业壁垒。过去我们保护古籍,更多的是在物理层面,比如改善库房环境、修复破损书页,能接触到古籍的只有少数专家学者。现在通过数字化技术,一部宋版书可以被全球的研究者查阅,一个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网络欣赏到《永乐大典》的细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新技术让古籍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了科学驱动。比如过去修复师要靠肉眼判断纸张纤维,现在通过光谱分析就能精准匹配补材;过去学者要花费数天对比版本差异,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坚守“原生性保护优先”的原则,数字化不能替代古籍本体的保护,智能技术的应用不能改变古籍的原始信息,这是底线。

记者:您提出“公私藏共同守护文脉”的理念,这与传统的“古籍应归公藏”观念有所不同,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这样的转变?

张志清:这个转变源于我对书史历史的感悟。历史上,过于集中的收藏往往在战乱、灾害中遭受灭顶之灾,比如历代的皇家藏书,除了清代散藏各处,得以保存外,其余朝代的藏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反而分散收藏于民间的很多古籍都能流传至今。过去我认为,公藏单位条件好,能更好地保护古籍,但实践中发现,民间收藏也有独特优势,一些收藏家专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能够穷尽奇书,反而能弥补公藏的不足。比如,天津是一位老工人,收藏了几百种《三字经》,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版本,就是对公藏的重要补充。

文脉传承需要多元化的保护体系:公藏单位负责保存珍贵古籍、制定标准、提供服务;民间收藏可以丰富藏品品类、激发社会活力。当然,民间收藏需要引导和规范,我们要通过培训、交流,提高民间收藏家的保护水平,形成“公私藏共治、共同守护文脉”的良好局面。

记者:在海外学术交流中,您观察到许多外国学者倾注毕生精力研究中华古籍。这种跨文化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古籍带来了哪些启发?

张志清:每次在海外见到外国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中华古籍,甚至毕生研究一部书,这既令我感动,也促使我反思。这种跨文化视角不是简单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帮助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发现古籍中那些被忽略的价值维度。

比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塞尔登地图》,在英国学者何大伟的考证下,被确认为中国人绘制的世界最早的东西方航海图。这提醒我们,以往过于注重经史子集的研究,却忽视了舆图等边缘文献的重要价值。再如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女士,专注于敦煌文献中的社会文书,从贩马契约、民间书信中解读普通人的生活。这让我们意识到,除了宗教、艺术等宏大主题,那些反映社会民生的微观细节同样珍贵。

古籍没有固定的解读方式,不同文化视角能挖掘出多元价值。现在我们推进“全球汉学合璧工程”,不仅是为了实现古籍的“数字回归”,更是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碰撞与互补,让我们对中华文脉的认知更加完整、立体。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坚守传统,也需要开放包容。(图片由张志清提供)

讲述

当你老了 ——年老,是每个生命必然的存在

口述 辽京 整理 何玉新

《在苹果树上》是北京作家辽京推出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部小说集里,辽京既刻画了人物年少时鲜活饱满的生命状态,也描摹出人到晚年,生命不断向内收缩的现实样貌。年老,是人人必经的生命阶段,作者在文字中格外关照老年群体,守护晚年的人格尊严,带领读者直面老龄化议题,进而引发大众对岁月、生命与晚年处境的深度思考。

以不同主人公视角
讲四代人生命故事

《在苹果树上》讲了一个家庭四代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相互衍生,所以读起来可能会有点儿像一个长篇小说,不过篇目之间是彼此独立的。

第一篇《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以秋晨的男性视角讲述了爷爷、奶奶的故事;第二篇《脚趾》,从米兰的视角出发,讲述她和她妈妈的故事;第三篇《在苹果树上》,讲的是秋晨和米兰14岁的女儿米豆的故事;最后一篇

《金子、绿豆与玻璃珠》,讲述了秋晨的姑妈秀娟与她的好友金子之间的友情。

小说集第二篇《脚趾》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米兰的妈妈每次看到一篇“心灵鸡汤”文章,就会给女儿写信讲述这些内容。这让米兰感到困惑:为什么要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讲给我听?而且还是用信件这样一种非常私人的、情感浓度很高的表达方式?在她看来,理想的母女关系应该是有爱、有争吵、有冲突、有和解,最后携手大团圆的。这些“心灵鸡汤”是没有用的,反而加深了母女间的隔阂。在小说中,这对母女的矛盾一直持续到结尾才慢慢解开。

最后一篇最初的名字叫《红头发姑姑奶奶的旅行见闻》。红头发,在西方文学里常常代表着一个相对叛逆、独立、野性难驯的女性形象。秋晨的妈妈是一个单身女性,到了晚年还在工作,还在旅行,因为她完全属于自己。她在旅途中和金子有过一段交往,金子成了她的映衬——她一直在外打工,晚年回去帮儿子照看聋哑小孙女,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的家庭。



《辽京小说集
在苹果树上》封面

我觉得这个小说集里面有一点探索的东西,跟我以前写的小说不太一样。比如我使用了“苹果树”这个意象,这也是米豆的好朋友方婷曾在纸上画过,用来代表世界、血缘和各种时间中的一个图像。

谈到这个小说集的诞生,我在第一篇写完之后,觉得还可以接着写秋晨和他身边人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后面的三篇。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很少留下遗憾,因为写作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成本投入,如果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继续写下去,这个人物还可以继续发展,那么我就会继续写。

小说不需要解决问题
只要把问题呈现出来

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是2008年,在《北京文学》的一个新人栏目上。就是自己投稿,他们那时候好像还不接受电子邮箱,我去邮局寄的打印稿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不久后编辑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们用了这篇

稿件。现在再看,那篇小说非常不成熟,讲了一个乡村故事,但是我完全没有乡村的生活经验,真的就是编。我那时比较年轻,可能编辑觉得,这个作者的小说有一点点纯净的特质,或者“自然文学”的特质吧。写完这篇小说之后十年,我没再写过小说。

2018年,我开始在豆瓣网站发表短篇小说,被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在2019年给我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已经36岁了。所以我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在某些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才能进入文学圈的视野,而是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平台,比如“豆瓣日记”,或者公众号都可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快乐,也很有一点点短暂的、可能一闪而过的,但又非常真实的成就感。我觉得这样就很好,说明我没有白写。至于结果,如果能够得到肯定,我也很开心。

在写作这件事上,我好像没有过游刃有余的时候,每次写新的小说都挺困难的。开头最难写,我经常卡在开头。可能写了几千字之后,慢慢会好一点,人物关系也理顺了,人物形象也变得鲜明起来。所以我经常会在写到最后时,返回去修改开头。写小说一旦变成一个熟练工种,就会出现一种风险——可能你的小说就会丧失魅力。

一个作者不能一成不变地写同一类故事,比如我上一篇小说写家族史,下一篇小说换个名字、换个时代、换个背景,再写别的家族史,这就是一种重复。即便读者不在乎,作者自己也会觉得:我怎么还在写这些?我应该写些不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小说不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呈现出来。文学里面所谓的生活,其实是要透过生活去看到生活背后的那些影子。可能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但那个答案就是我们所要书写的那些现实的影子。

人会一点点变老
越来越不像自己

《脚趾》那一篇,我写到母女关系,这其中有我自己的体会。我妈妈一直过着很平静的生活,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很有规律,好像她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也没有讲过她有什么特别痛苦或者特别不幸福的经历。我跟她很少深入聊天,她也没有真正地把她内心的想法告诉我,也许她一直觉得我是个不能理解她的小孩。

我在二三十岁时,也会感受到父母对我独立性的质疑、对我成长的种种限制。表面上看,他们是不放心,实际上是不够信任,可能他们对我的了解非常片面,停留在我的少年时期,没有意识到我已经成熟了。就像我对我妈妈的印象总是她四十多岁,我觉得我妈妈对我的印象可能也停留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时间会慢慢弥合这样一个差距,等我们都慢慢老去,可能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吧。

《在苹果树上》这本书,我写到了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虽然我拿了“青年文学奖”,但它的年龄上限卡在45岁,而我觉得,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一个人拥有很漫长的过往,但也拥有一个很漫长的未来,那么他就是中年人。在我现

在这个年纪谈衰老,更多的还是对青春的一种惋惜,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衰老是非常孤独的事。

我记得有一次,奶奶让我给她买棉马甲,天冷了,家里没暖气的那些天可以套在毛衣外面穿。她特意跟我说,一定不要买带拉链的,因为她年纪大了,关节不好,手指的精细动作退化了,拉链对不上,所以要买系扣的,扣眼也必须够大。我就想,一个幼儿手指的精细动作,是一点一点从没有慢慢训练出来的,到了年老之后,这种退化就像回到了幼儿时期。

所以人的衰老不是一下子躺下,一下子动不了了,而是在非常细碎的,想象不到会成为障碍的那些环节上,全部成了障碍。人就一点一点变得衰老,越来越不像自己。因为身上的这种退化,在精神和性格上,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可能过去感兴趣的事,现在变得没兴趣了。我奶奶就是这样,她身体好的时候特别爱看电视上的《法制进行时》节目,各种各样的案件,后来她对这个节目没兴趣了。自从眼睛不好了之后,她也不爱看书了。好像这个人就像有些歌的结尾那样,渐弱、淡出,不是一下子停了,而是声音越来越小。

我在小说里写到一个人的衰老,更多的是写他衰老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旅行,喜欢聊天,性格外向,很活泼,有时候也会讲邻家的八卦。但是,随着衰老的来临,他的生活半径越来越小,连屋门都不出了,固守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只有写出这种变化,才能表现出衰老带来的巨大悲哀。这中间可能有许许多多漫长的过去,但也非常多的细节,可以一点点剖开写。